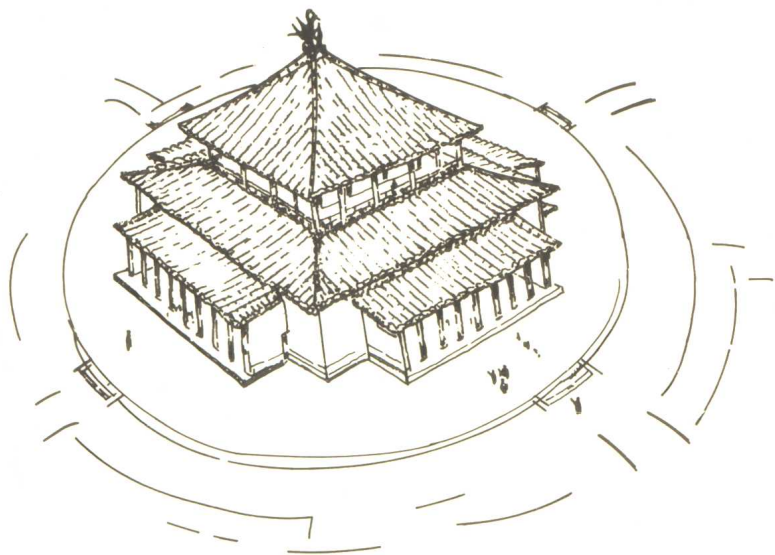


汉唐都城 礼制建筑研究

姜波 著

考古新视野丛书



文物出版社

考 古 新 视 野 丛 书

汉 唐 都 城 礼制建筑研究

◎ 姜 波 著

文 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段书安

封面设计:张振钢

周小玮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校对:周兰英

华 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姜波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3

(考古新视野丛书)

ISBN 7-5010-1402-7

I. 汉… II. 姜… III. ①宫殿—古建筑—研究—中国—汉代②宫殿—古建筑—研究—中国—唐代
IV. K87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088 号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

姜波 著

文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100009)

http: //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ne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 印装

新华书店 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0-1402-7/K·649 定价: 26.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汉唐都城礼制建筑遗址的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以朝代和都城为坐标,对每一时期、每一都城礼制建筑的建筑结构、分布状况、分布规律、祭祀对象加以讨论。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看出汉唐礼制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礼制逐步规范、简化的趋势,二是礼制逐步沦为政治的附庸。

汉唐时期,随着国家祀典的逐步形成,郊祀天地、大享明堂、左祖右社、五郊迎气、朝日夕月、东耕西蚕逐渐成为国家大祀的基本内容。这套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背景。

随着皇权的加强,至上神昊天上帝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天地诸神也被确立了明确的等级制度。随着神的等级世界的建立,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祭祀权利也有了明确的划分。

西汉中晚期以后,阴阳五行的观念和儒家礼教逐步成为封建王朝的国家哲学,都城礼制建筑也被按照这些哲学原则予以安置。南郊祭天以先祖配,北郊祭地以先妣配,是严格按照阴阳观念确立的。群神以类相从、分别祭祀于五郊坛,是五行观念在祭祀传统上的反映。大享明堂、释奠孔子、东耕西蚕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达到隆祖尊君、推行教化、劝课农桑的目的。

礼制建筑的位置逐步从宫城向城郊移动,标志着神权逐步沦为皇权的附庸。

专家推荐意见(一)

汉唐时期的礼制建筑,在当时都城规划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封建礼制对保障帝王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学者仅据文献的记录,很难弄清唐礼制建筑的具体情况,更难对汉唐时期礼制建筑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因此有关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缺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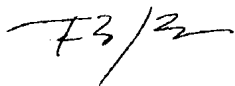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不断在汉唐时期的都城遗址的勘察和发掘中,发现当时的礼制建筑遗址,并对许多重要的遗址进行了发掘,目前已经发掘的各时代的礼制建筑遗址已近20处,且多有考古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发表,在此基础上结合古代文献,已有可能对唐汉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综合研究,因此《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一书正是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作者依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初步将自秦汉至隋唐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曹魏时期和唐代。指出汉唐时期的礼制建筑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逐步简化,且日趋规范;另一方面是礼制建筑和宫殿建筑日渐分化明显,标志着礼制日渐从属于皇权。这一具有新意的论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由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还无法全面展现自汉至唐各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全貌,所以还有许多问题还难以解决,作者也以严

谨的态度,提出有关疑问,还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对汉唐都城目前尚未被发现或发掘的一些礼制建筑的方位,进行预测,为今后的考古勘察和发掘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线索。

总之,本书能够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完成对研究课题的论述,具有学术上的创见,是较优秀的博士论文,因此我推荐本书出版。



2001年12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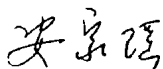
专家推荐意见(二)

古代中国,以祭祀为国之大事。礼制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五十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汉唐时期的礼制建筑已发掘了近二十处,而且秦汉—隋唐时期正是中国礼制逐步完备的重要时期。目前考古学界对礼制建筑遗迹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缺乏综合研究。《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一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论文注重实证,强调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作者全面掌握了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由于考古材料缺环较多,有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解决,作者在论文中也实事求是地将疑难问题摆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该论文资料收集全面、梳理清楚、研究方法科学求实,研究态度严谨。

本论文将秦汉—隋唐分为四个发展时期:西汉晚期、东汉时期、曹魏时期和唐代,历代礼官都认为最完备的礼制是在西周,时代越晚,礼制越不规范。姜波通过研究提出全新的看法:汉唐礼制建筑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逐步简化、规范的趋势;一是礼制建筑与宫殿建筑的分化明显,标志着礼制逐步沦为皇权的附庸。这一研究结论是很有新意的,会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作者对汉唐都城的一些礼制建筑的方位进行了推测,为考古工作者将来的勘探发掘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本论文的文字表达清晰准确、观点鲜明,是一篇优秀博士论文。鉴于以上原因,我向出版社郑重推荐这本论文的出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安家路' (An Jialuo).

2001年12月26日

课题的论证与论文的出版

1996年9月,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刘庆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汉唐都城考古。1997年上半年,刘庆柱先生为我精心选定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及以后在都城考古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一定是遵循了当时的一些礼制原则的,如左祖右社、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东郊朝日、西郊夕月等等。这些礼制上的传统,本身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利用考古实物资料,结合文献记载,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98年5月,我以《武则天时期礼制建筑研究》为题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并通过了论文答辩。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岩先生,委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先生、考古研究所的安家瑶先生。

1998年9月,我又考上刘庆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经过审慎考虑,决定继续以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作为本人的博士论文题目。1999年夏,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提交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正式确定以《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通过了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当时参加评审的委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卢兆荫先生、杨泓先生、孟凡人先生和导师刘庆柱先生。就是在这一次学术评审会议上,诸

位先生对本人博士论文题目作了深入的讨论和周密的论证,最终达成以下结论:

1. 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考古资料,具备了开展研究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2. 论文的撰写应该立足于考古材料,重视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

3. 论文所涉及的时代,应该界定在秦代至唐代;秦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都城礼制建筑,可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4. 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研究,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研究者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从1999年秋开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论文的撰写工作。2000年3月1日,我向考古系提交了《博士论文调查申请报告》,拟赴大同、杭州、南京等地实地考察相关的都城礼制建筑遗址。报告经系主任王巍先生的审阅,得到批准。接下来,我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考察活动,全面收集相关的考古资料:

2000年5月15日—20日,赴大同考察北魏平城遗址和明堂遗址。

2000年6月6日—10日,赴杭州考察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和良渚文化莫角山、汇观山、瑶山祭坛遗址。

2000年6月10日—12日,赴上海博物馆收集有关古代祭祀的文物资料。

2000年6月12日—16日,赴南京考察六朝建康城遗址和南京紫金山六朝祭坛(地坛)遗址。

此外,对汉唐两京礼制建筑遗址的调查,也开展了以下工作:

1997年9月,赴西安实地考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遗址、唐长安城南郊圜丘(圆丘)遗址。

1997年10月,赴洛阳考察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唐东都明堂遗址(1993—1996年,我参加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期间也曾对唐东都明堂遗址作过实地考察)。

2001年3月7日,参加亚洲史学会第10次(北京)研究大会,听取安家瑶先生以“唐长安城的圜丘及其源流”为题所作的学术演讲。

上述实地考察和学术活动对本人论文的撰写具有重要意义。

到2000年底,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的撰写工作。2001年4月初,完成修订稿,提交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审阅。2001年5月9日上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先生,答辩委员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高崇文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先生、孟凡人先生。同行评阅人为北京大学赵化成先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孔祥星先生。

2001年7月,我毕业后回考古所。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临时安排在考古所科研处。繁重而琐碎的事务工作,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原来打算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补充的计划,也随之搁浅。2001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资助,计划列入文物出版社“考古新视野丛书”中出版。

2002年5月,我将文稿交付文物出版社。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出版,除个别注释和插图作了简单调整以外,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了论文答辩时的稿样,它的不足与缺憾,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在今后能够再按朝代(比如唐代)作出更深入的个案研究,同时也希望以汉唐时期为基点,追溯先秦时期的祭祀传统。

此次论文的出版,得到了段书安、王仁湘诸位先生的鼎力相助,导师刘庆柱先生拨冗为之作序,在此深表谢意。

序

姜波同志让我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写篇序,我是他的导师,自然就成了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姜波同志 199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入研究所后,根据他本人的兴趣、专长和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需要,被分配在汉唐考古学研究室,参加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隋唐洛阳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实践,对他今后的考古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96 年 9 月,姜波同志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我的名下,攻读汉唐考古学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汉唐都城考古。根据姜波同志在隋唐洛阳城的田野考古工作情况,考虑到他的文献功底较好,针对汉唐都城考古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确定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为《武则天时期礼制建筑研究》,姜波同志提前一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撰写,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1998 年 9 月,他又考上了我的博士研究生。

我和姜波同志曾就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进行过认真研究,确定了“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的论文题目,我想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目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形势、任务,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早期国家的发展、历史时期王朝政治的变化等,成为中国考古学中的重大课题。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城”、“都

城”是最为重要的考古学研究载体,而在“城”、“都城”之中的核心建筑是“宫庙”,即朝政的宫殿与礼制的宗庙。由此可见,礼制建筑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中国古代礼制建筑源远流长,关于中国古代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工作情况,各个时代很不一样。其中以汉唐时代的都城礼制建筑遗址开展考古工作较多。如汉长安城“宗庙”、“社稷”、“辟雍”(或为“明堂”),汉魏洛阳城“明堂”、“辟雍”、“灵台”,北魏平城“明堂”,南朝“北郊坛”,唐长安城“圜丘”(或“圆丘”、“天坛”),唐洛阳城“明堂”遗址等,均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考古新资料。

第三、作为历史考古,古代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古代礼制建筑的文献记载虽然出现时代很早,如《周礼》、《仪礼》、《礼记》等均有关于古代礼制建筑方面的记载,但是考古资料显示,这些记载,其可信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汉代以后,有关都城礼制建筑的文献记载越来越丰富,其可靠性也是先秦文献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

第四、如前所述,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礼制建筑考古发现资料很少,可靠的文献又极其有限。其研究条件远不如汉唐时代礼制建筑,从汉唐时代礼制建筑研究开始,是进一步探讨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礼制建筑的最好的、最科学的途径。

姜波同志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对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汉魏洛阳城“三雍”遗址、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南京六朝北郊坛(地坛)遗址、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唐洛阳城明堂遗址和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应该说《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吸收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的汉唐时代都城礼制建筑结构的特点、空间分布规律、祭祀对象、规划和营造礼制建筑的指导原则、汉唐时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等重要学术

观点是可信的、有新意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基于考古发现为科学前提的这项考古研究工作,由于考古学学科发展滞后的影响,还有不少学术空白。如关于宗庙的考古资料,目前只见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中的宗庙遗址和南宋临安城的太庙遗址;社稷遗址仅在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考古发现,灵台、太学遗址的考古发掘仅限于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中,圜丘和北郊坛遗址只分别发现于唐长安城与南京六朝都城。这些都给这项考古学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同时也向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创造了机遇。鉴于上述情况,本书的一些看法,只能作为一种阶段性成果,它可能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会有所发展。我想这是科学研究规律所决定的。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是关于中国古代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子课题,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将为进一步开展先秦时代都城礼制建筑考古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先秦时代都城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的开展和推进,将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等重大学术课题的探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学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是逐步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作为考古学、历史学同样要遵循上述科学规律,才能使其学科健康地发展。近年我们经常看到不少地方有关发现史前时代的“庙”、“坛”一类祭祀建筑遗址的报道或研究文章,我不清楚将这些史前时代遗址确定为“庙”、“坛”建筑遗址的参照物是什么?它们的建筑使用功能是什么?这些“庙”、“坛”等是祭“天”、祭“地”(或祭祀“自然”)还是祭祀祖先?祭祀的原因又是什么?“假设”对于科学研究是必须的,但是自然科学的“假设”需要得到科学实验的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假设”需要由已知向未知的科学推导和相应社会调查的实践验证。“望气”是“感想”不是科学研究;“自圆其说”反映了逻辑的科学性,但不是

科学研究的结论。在对夏商时代的礼制建筑眉目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在对汉唐时代礼制建筑仅仅只有初步了解的前提下,就把历史考古中尚未究明的礼制建筑内容引申到史前时代,从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两方面来看都是很危险的。为了保证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前时代祭祀遗址的考古学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历史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要建立在夏商时代的都城礼制建筑考古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探讨史前时代祭祀遗址的“起点”,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考古学家只能顺着人类历史的时空隧道一步步往回走,这样才能走向科学的彼岸。

姜波同志在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考古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朝着既定科研方向,推进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考古学研究,不但要把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向下推至宋元明清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向上推至先秦时代都城礼制建筑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代的礼制建筑研究,还要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加科学地界定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

刘庆柱

2002年5月6日

前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祭祀与战争被看作是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这种思想，反映到古代都城的营建上，便有了“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的说法^①。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祭祀天地社稷祖宗的古代遗址，便不断有发现，著名者如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东汉明堂辟雍灵台遗址、南朝刘宋北郊坛遗址、北魏平城明堂遗址、隋唐长安城圜丘遗址、武则天明堂遗址等。这些考古发现，揭开了中国古代祭祀传统的神秘面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明堂、郊坛一类的祭祀性遗址，考古学界一般称之为“礼制建筑”遗址。为便于讨论，我们不妨给“礼制建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在按照儒家经典的祭祀原则、在古代都城范围内修建的、对天地祖先人鬼等举行国家祭祀活动的建筑设施。这些建筑设施包括：祭天地的南北郊坛（圜丘与方丘）、祭祖的宗庙、迎时气祭五帝的“五郊坛”、祭土地和五谷的社稷坛、祭先农先蚕的先农坛和先蚕坛，以及明堂（祭天享祖之所）、辟雍、太学（释奠孔子之所）和灵台（不仅仅是天文台，还兼具望云物、察祥瑞、兴祭

^① 《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高堂隆传”，711 页。

祀的功能)等。

可以看出,我们讨论的礼制建筑,主要是儒家的祭祀场所,而与道、释二家的祭祀不相关涉。以前学者在讨论古代礼制时,有将道教、佛教内容纳入礼制范围的作法,称“二氏礼”,比如,清人徐乾学作《读礼通考》,即有“僧道制服”之条目。北魏平城大道坛庙(后改崇虚寺,为北魏最著名的道教建筑)、北魏洛阳永宁寺、唐长安城的大慈恩寺(大雁塔之所在)与荐福寺(小雁塔之所在),以及武则天在洛阳修建的佛舍——天堂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宗教建筑。汉唐时期,对道教的尊崇,以西汉、李唐为最;对佛教的推举,则以北魏、萧梁为甚。但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国家,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没有取得过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特权。中国的这种情况,同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古代,即使有皇帝或皇室成员的参与,宗教崇拜始终局限在个人行为 and 民间崇拜的范畴;而天地祖先的祭祀,则被抬升到“国家大祀”的程度,是一种国家行为,二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因之,本文的讨论,虽然较多地涉及了祭祀性建筑,但不涉及都城内的宗教建筑^②。

自西周以迄明清,中国古代的祭祀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出,理想中的祭祀原则,虽然从西周时期已经开始酝酿,但直到汉唐时期才逐步形成完整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礼制建筑的安置,便成为当时都城规划的重要内容。

② 唐玄宗时期设立的玄元皇帝庙(老子庙),是一个例外。玄元皇帝庙祭祀的是老子李耽,但主要的不是作为道教始祖而是作为唐朝皇室李氏的远祖来祭祀的,所以,当时对玄元皇帝庙的祭享活动,主要的是带有祖先崇拜的性质,而非宗教崇拜的范畴,故本文将其列为研究对象。